走向全国 追求个性

□王春林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晋军崛起”使山西小说在全国文坛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此后一段时期山西文学创作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令人惊喜的是，这种情形在进入新世纪之后有了明显的改观。当下的山西文坛，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良好艺术潜质的青年新锐小说家。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杨遥、小岸、李燕蓉、李来兵、手指、孙频、阎文盛、张乐朋、韩思中、杨凤喜、李心丽、曹向荣、燕霄飞等，可以说都是其中的引人注目者。就年龄构成来看，除了个别作家属于“60后”与“80后”之外，其他大部分都是“70”后作家。尽管说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思想艺术风格不一，目前所取得的创作成就也显得有些不太整齐，但能够有两位作家先后获得鲁迅文学奖，能够有作家入选“未来文学大家”，能够有不少作品频频发表于全国各大文学期刊，所有这些都说明，这批作家正在全国文坛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一下子出现这么一个创作潜力巨大且已产生了不小影响力的小说家群体，确实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他们的创作，形成了若干值得注意的特点。

其一，是对于现实生活的关注与思考。以小说的形式表现处于急剧变化过程中的现实生活，既是山西文学界传承多年的艺术传统，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创作主流。这一点，在山西的新锐作家中同样有着突出的表现。葛水平是一位对中国乡村民间生活异常熟悉的作家。正如她的一篇名为《地气》的小说一样，葛水平自己就是一位接地气的作家。在《甩鞭》中，她既让作为长工的铁孩对王引兰说“贫农就没有你好看”，也让历经苦难的王引兰作为小妾与“地主分子”麻五倍加恩爱。这一点，有力地凸显出了作家对于历史的思考表现深度。在李骏虎的笔下，我们既看不到乡村世界中围绕权力的争夺而形成的不无激烈的“官场”争斗，也看不到对于农民们被侮辱被残害的苦难生存状况的刻意渲染。他的获奖中篇小说《前面就是麦季》所透视表现的，乃是不无温情色彩的北方乡村农家的日常生活图景。王保忠近年来专心致志于短篇小说的创作，在这一方面颇有心得。他的系列小说《甘家洼》将甘家洼这个小村庄作为被解剖的麻雀，鲜活生动地再现了现代化强烈冲击下，中国乡村世界的精神痛苦。韩思中的小说创作始终关注思考的，同样是自己十分熟悉的乡村世界。他的中篇小说《结束狗命》通过对于李仁义、黄美丽以及赵忠信这三位普通村民的形象刻画，鞭辟有力地表现出了现实权力统治之下的底层民众生存的艰难。

其二，虽然长期生存于古老的黄土地上，但一些新锐作家却突破传统的羁绊，在他们的小说作品中表现出了思想形式层面上的探索实验意味，不无尖锐地切入表现着当下时代人们的精神困境。杨遥的小说故事尽管大多都发生在乡村世界里，但无论是《二弟的碉堡》还是《闪亮的铁轨》，我们却总是能够从中强烈地读出一种卡夫卡的味道来。一种现代主义意味的存在，在一直致力于短篇小说写作的杨遥这里是毫无疑问的一件事情。手指一向被看做是山西年轻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寻找建新》在叙事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恐怕就是对于第一人称复数“我们”的巧妙征用。在“我们”寻找建新的过程中，所折射出的依然是一代人无法摆脱的生存焦虑。李燕蓉迄今最值得注意的小说，仍然是《那与那之间》。这个短篇讲述的是一个颇有一些荒诞色彩的故事，作家对于那个差不多处于死亡状态的失忆者的角色设定，就为同事们最终露出原形的表演提供了极好的机会。但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眼看着就要成为现实的死亡，居然也会是一场骗局。

毫无疑问地，摆在这些新锐作家前面的路还很长。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自己的小说创作形成独特鲜明的艺术个性，再上一个新台阶，是这批新锐作家无法回避的艺术挑战。

一支颇具潜力的队伍

□杨占平

山西的作家队伍，是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结构合理、成果丰硕的劲旅，在全国文坛令人瞩目。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作家，已经初具规模，成长为举足轻重的力量，成长为备受瞩目的文学新锐，主要有葛水平、李骏虎、王保忠、玄武、韩思中、小岸、杨遥、李来兵、李燕蓉、杨凤喜、曹向荣、阎文盛、手指、孙频等。近年来，刘慈欣的科幻小说创作成就卓著，影响巨大，他同样属于新锐作家中的一员。

这批青年作家大抵在30岁到40岁上下，创作时间有长有短，创作实绩也参差不等。但是，这支年轻的作家新军潜力不小，他们中的几位佼佼者已经在全国文坛具有了较大的影响，在一些全国性重要文学评奖如鲁迅文学奖等，以及有着广泛影响的报刊评奖中榜上有名，是各类权威性文学选刊上的常客。

文学创作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全面冲击，整个文学逐渐失去往日的辉煌，开始趋向边缘化。这批新锐作家却执著地、不为时潮所动摇地踏上写作之路，使得山西的作家队伍避免了“断代”现象。这批青年作家大部分生活在基层，供职于小城市，生活条件并不宽裕，只能在工作之余从事创作，有很多困难。可贵的是，他们矢志不移地坚持笔耕，写出了一篇又一篇作品。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这批作家逐步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特色。现在，他们的创作正趋向成熟，势头看好。

从创作思想和表现方法上考察现在的山西青年作家，无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山西前几代作家的创作传统。比如他们对急剧变革的现实生活的热切关注，对普通民众生存命运的体验与表现；比如他们在艺术表现方法上基本使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同时也注意吸收其他创作方法中有益的成分。但是，这一代青年作家刚刚涉足文坛的时候，正是国外各种文学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思潮和国内各种文学主张盛行之时，客观上对他们的创作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既有正面作用，也有负面效应，总的看，却是有利于他们在继承前辈作家传统基础上，形成比较开放的、具有时代精神特征的创作风格。

我把这些青年作家的创作特征，大致归纳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他们的作品呈现出了社会现实的丰富性、复杂性与鲜活性。由于这批作家一直生活在底层，跟大多数普通人一样，亲身经历了乡村以及中小城市的一系列改革，可以说，改革的每一步历程都与他们的生存命运息息相关。这种切肤之感、这些命运攸关的体验，倾注在他们的作品中，就真实地再现了生活的丰富与生动，具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特色。其次是他们有比较敏锐的艺术感受能力。读这些青年作家的作品，你会感觉到很少有那种苦涩的理性思考和个人心态的渲泄，更鲜有那种居高临下的发言姿态；他们总是以一颗“平常心”去感受和体验世界，感受和体验人生，感受和体验写作，这样，他们就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事物的基本特征，敏捷地洞察出人物的心灵奥秘，人物和场景在他们的作品中既表现得真切、自然，又具有他们比较鲜明的个性判断力。第三是他们在艺术探索上不拘一格。这一代青年作家在艺术表现上，除了上述总体上的相同点外，细分起来还是有几种类型的，有的倾向于现实主义方式，有的侧重于现代手法，有的则介乎于二者之间，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

尽管现在的这一代山西青年作家已经取得了可喜的创作成绩，并成为整个山西作家队伍中一支活跃的作家群体，但他们的局限和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同前几代作家相比，在生活体验的广度和深度上，他们跟赵树理、马烽等老一辈作家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尤其是老作家们以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以通俗易懂、流畅明快、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色，以直面现实、努力揭示生活矛盾的精神追求，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并且被誉为“山药蛋”文学流派，这是青年作家还需要不断磨砺才能企及的；在理论素质和艺术修养上，他们还不像成一、李锐、张平、周宗奇、韩石山、张石山、钟道新、哲夫、蒋韵、赵瑜、王祥夫等“晋军”作家厚实，特别是这些作家靠各自有个性的作品和文学主张，取得让全国文学界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值得青年作家好好努力了。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得远一些，山西青年作家与江苏、上海、北京、广东等地同龄同代的作家相比，他们的局限与弱点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他们的知识准备不足。山西青年作家中接受过名牌正规高等院校教育的还不多，这就使他们在知识准备上显得有些先天不足。此外，由于那些省、市地处改革开放前沿区域，经济和文化都比较发达，青年作家们接受新事物和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自然比内地同行要快一个节拍；而山西青年作家地处改革开放相对晚一些的区域，对于许多新事物和新思想的接触，不免要晚一定的时间，于是，在观察急剧变革的现实社会方面，在使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不过，我认为，山西青年作家们已经意识到了他们的这些局限与弱点，正在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努力克服自己的不足，他们是有可能创造出新的辉煌的。

城乡胶着中的寻觅

□陈 坪

山西新锐作家，除了少数人是来自于城镇外，大部分人都生于乡村并成长于乡村文化的环境中，因而有较丰富的底层生活体验。其中许多人又有着在县、市一级乃至省会中谋职和打拼的经历。作为游走在城乡背景之间的旅人，在感受着城市变化带来的新奇和诱惑的同时，他们内心也难免会产生一些失落和挣扎，从而在他们的创作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的纠结和冲突。在李骏虎、杨遥和小岸表现城乡生活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到在城市空间里活动的人的欲望是如何膨胀和释放、人的自我又是如何迷失的，并为作者对传统乡村精神的那种执著的守望姿态所触动。

李骏虎的《七年》《牛郎》《解决》《那我们去哪里呢》和《心跳如鼓》等作品中，由于失去了与历史的联系以及对未来的确定性的憧憬，其主人公对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及未来的归属都缺乏明确的概念，呈现出一种无根的漂浮状态。他们在城市生活的旋涡中身不由己，要么受到无法改变的外在力量的操控和刺激，为贪婪的欲望和恶意所驱迫，要么身心困顿疲惫、行为方式诡异。

与李骏虎笔下有如水上浮萍似的难以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物不同，在表现乡村生活的小说中，他提供的是另一种形象。通过《用镰刀割草的男孩》《前面就是麦季》《五福临门》《留鸟》《还乡》等作品，李骏虎在做一种逆向性的精神寻觅。在想象的催孕和重酿的作用下，他为读者描绘出一幅幅原生态的乡村生活和乡村风貌的生动画面。在对这种已经或行将逝去的中国乡村及乡村生活的描绘中，人是大地之子，在自然的环境中活动；心属于身，因身的存在而存在。它们是统一的，正如人与自然是统一的、是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尚未因过度的贪欲而分裂。人的欲望和心理活动也都能得到充分合理的解释。在以城市及其商业化的进程为背景的《留鸟》《师傅越来越温柔》和《还乡》中，土地和乡村生活更是被赋予了人精神归宿的意义。

杨遥是一个具有奇特想象力的作家，他擅长用隐喻的手法来描写小人物的命运。在他最具代表风格的《二弟的碉堡》中，杨遥为读者展示了一个不安于乡村生活本分的另类形象。“二弟”节俭、聚敛和贪婪，善于经营并知道如何以最少的成本去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是乡村平和宁静的生活方式的叛逆者，因而引发了被称为“鸟镇”的村民们的嫉恨和不满。杨遥把村民对另类生活方式的抵制转化成一场荒诞的较量：她在自家院墙的扩张遭到挫败后，挑衅地将新房盖成了一座高高的碉堡，在碉堡中张扬着自己另类的快乐，而被激怒的村民则群策群力地发起了一场倾倒垃圾运动，要将“二弟”的碉堡彻底埋葬。“二弟”率领家人做着顽强的抗争，并怀着对鸟镇人深深的轻蔑将一块乌鸦的刺绣作为旗帜“高高插在屋顶上”。在这个讲述“二弟”一家与村民对峙的寓言中，垃圾运动的参与者们实际上是将人心中所有见不得阳光的阴暗都倾倒了出来，而“二弟”则用一面高扬的精神旗帜回敬着围攻者。杨遥在对乡村心态淋漓的揭示中同时也对城市化所代表的唯利是图的价值取向给予了调侃和嘲讽，使作品更加具有犀利的批判锋芒。而《为什么骆驼的眼神总是那么疲惫》的主人公，是一个对城市生活业已绝望的形象，他发现自己对生活的前景已失去了热情，为深入骨髓的挫折感和倦怠感所征服，就像女儿的童话书中那匹已经知道不会在连绵不断的沙丘之后有所发现的疲惫的骆驼。他不再愿意出门，并像猪似的变得肥胖，最终在妻子带回来的一个呼啦圈上找到了救命的稻草。他执著而偏执地转着呼拉圈，越转越快，最后化作一股龙卷风破窗而出，消失了。杨遥借助这个故事，深刻地表达了小人物逃避生活的渴望，是对城市背景下无奈的人生状态耐人寻味的反讽。

一般人都倾向于认为女作家要比男作家更愿意相信爱情的力量和感情的永恒。但在读小岸的作品时，你会改变这种印象。在《水仙花开》和《半个夏天》中，小岸将城乡生活之间的距离视为阻断纯真男女之情的天然屏障。在她笔下，是城乡背景的现实差异决定了男女之间的情感能否发生和维系；而乡村女性，如果不能进入城市谋求更高的自我发展，那她对感情生活的向往就只能是非分之想，对享有理想而浪漫的爱情就只能是一种心灵的奢望。

乡村题材写作的创新

□侯文宜

讨论山西新锐作家群，不能不说乡村题材写作仍然是其主流和突出的特色。

从上世纪末到新世纪以来，文学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现代化、城市化生活日益成为社会的中心，新都市、新市民、新体验写作跃居文学前台，在这种情况下，乡村题材文学的确边缘化了。但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潮流并不是决定的因素，写什么样的东西在于脚下的生活是什么，在于生活体验和生活的孕育。由此决定，乡村题材文学的执著耕耘仍然是中国内陆省份尤其山西文学的一个突出特点。作为一个黄土高原的农业省份，如果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就以写乡村驰名全国，创造了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一页，从上世纪80年代的“晋军”崛起，到上世纪90年代的王祥夫、曹乃谦、张行健、谭文峰、房光们又擅长以乡村题材写作凸显晋风特色，那么，及至新世纪成长起来的这代新锐作家群，诸如葛水平、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曹向荣等等，乡村书写依然是他们的钟情和亮色。

自然，文学史的视野是我们在考察乡村题材文学中需要的。就当下这批新锐作家群来说，其乡村书写的新质何在？与前几代作家有哪些不同？应该说，这种新质和不同既是山西代际之间的，也是时代文化气息的折射，呈现出一种从主题内容到艺术笔法的新变。读这些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会发现，他们的乡村题材写作已不再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可以概括，无论在关注“现实”的题材和内容层面，还是在情感和艺术形式方面，与以往的农村题材都表现出明显差异。倘若说曾经的“山药蛋派”主要是写农业合作化改造、是土地的重新分配和农民的翻身问题，其后“晋军”仍主要是写农民的贫穷愚昧和脱贫问题，而当今时代生活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这代作家走出了前辈模式，把创作视野转向了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峙与撞击中的乡村、农民的生存命运，显示了主题的转换。例如王保忠引起反响的《奶香》写了金钱挤压下乡村小人物的尴尬，小说写尽木生一家求生存的无奈，因始终有一个他者的城市作为参照和比衬，使小说获得了一种时代特色的深刻背景。杨遥《闪亮的铁轨》则写京原铁路给一个叫做“弧”的村子带来的某种开放和环境污染，原本以为村子会因它热闹起来，但村人得到的是车窗里扔出的饮料瓶和废纸，现代化的铁轨并没能改变村子排外的封闭和宁静；《二弟的碉堡》则通过“二弟”的养殖致富给村人带来的不安，写出乡村世界两种文明的冲突与对峙。还有曹向荣的《憨憨的棉田》，主要写农人对土地的热爱，写乡镇工厂给棉田带来的污染危害和农人对种植生活的维护。其他如杨凤喜的《豆花》、李来兵的《别人的村庄》也都写出了乡村社会结构性、价值观的激荡。这些小说在审美情感上一面表现出追求现代性的历史愿望，一面又不无保守、质疑和反思，由此带来一种新的艺术风格。

在这代作家的小说创作中，已经不是把写出现实矛盾冲突作为小说的重心，而是一种对人类本性、欲望的思考和茫然，现实与历史、外在与内心、写实与魔幻、存在与穿越，种种复杂因素交织于一体。杨遥的《奔跑在世界之外》写现实中的人心冷暖却用了一个超现实的意象隐喻，李来兵的《客人》将乡村女性生存的寂寞、内心情感需要和外在世界的冷漠写得虚幻缥缈。即使对乡村美好人性和淳朴伦理情感的书写，王保忠的《柳叶飞刀》、曹向荣的《泥哨》、杨凤喜的《镰刀》等，也往往是对正在式微中的农业文明的一种抒情式重温。此外，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葛水平的乡村小说，尽管她常常被作为女性文学的话题来讨论，其乡村小说更注重民间语言和民间文学形式的汲取，追求故事的传奇化和穿越性，将乡村文学的朴素描写与现代派文学的象征手法嫁接一处。

乡村小说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尤其对山西这样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转型中的乡土地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山西新锐作家的乡村小说创作具有独到的审美价值。

对短篇小说传统的继承和拓展

□段崇轩

山西新锐作家在短篇小说上的执著追求和可喜实绩，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学现象。他们十几年来坚守在短篇小说领域里不懈耕耘，作品在全国各大刊物报纸“遍地开花”，被各种选刊、选本频频转载。他们接续山西文学的地域文脉，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又汲纳新的文学思潮和观念，努力打造自己的创作模式和个性，在短篇小说领域里风生水起，已引起了全国文坛和广大读者的瞩目。

山西有一个持久的、强劲的短篇小说创作传统。在6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曾经出现过两次创作高峰期。第一次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山西老一代作家赵树理、马烽、西戎、李束为、孙谦、胡正等开创的“山药蛋”文学流派，他们那些充满了浓郁的地域性和时代性的短篇小说，已成为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第二次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崛起”的“晋军”作家如成一、李锐、张石山以及稍后的王祥夫、曹乃谦等创造的山西文学新时期，他们那些饱含人生体验和忧患意识的短篇小说，已成为经典性作品而广为流传。这些作家，他们都是从短篇小说上起步的，他们的成名作、代表作大抵是短篇小说，尽管他们后来也创作有中篇、长篇小说，但一有好的题材和构思，就又会转向短篇小说创作。短篇小说成为山西几代作家的“文学情结”，短篇小说的发展显得格外强健、成熟。

山西新锐作家群在山西文学的“族谱”上应当属于“第五代”。他们出生于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期，大多数生于70年代，年龄相差十六七岁。他们于90年代之后走上文坛，又不约而同地把短篇小说作为主要文体。他们的文学追求和理想，要比前几代作家远大，不再满足于成为本土的地域性作家，一出道就放眼全国、冲击文坛。这个作家群，具体分析又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短、中、长篇小说乃至其他文体“兼收并蓄”的作家，如葛水平、李骏虎、闫文盛、孙频、李燕蓉等，他们兼写多种文体，而短篇小说成为他们创作中的重要部分。另一种是主攻短篇小说、其他文体为辅的作家，如王保忠、杨遥、杨凤喜、李来兵、手指、张乐朋等，他们把短篇小说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在读书、写作中潜心探索它的艺术规律和表现方法，推进着短篇小说的发展。他们通过短篇小说出道、成名，又通过短篇小说锻炼、提高。

在短篇小说“写什么”和“怎样写”两个方面，显示了山西新锐作家的创作追求和特色。既往的山西短篇小说有两个特点，一是深入表现社会现实生活，二是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这批青年作家在这方面既有继承，也有拓展。王保忠的《家长会》写以煤老板为代表的“煤金”世俗文化和以校长清河为标志的精英文化的较量与博弈，李来兵的《别人的村庄》写民间“硬汉”同“土皇帝”村长的斗智斗勇，李骏虎《留鸟》写郊区农村大拆迁中农民对土地和传统生活的留恋、追寻等，都广阔、深入地表现了当下社会的现实生活。这批作家在反映底层生活上也有可贵的探索和贡献。杨遥《二弟的碉堡》《谯楼下》都表现了底层社会的矛盾冲突和底层民众的艰辛、抗争。如张乐朋的《童鞋》《偷电》《边区造》揭示了底层人物身上自私、卑劣、狡猾、盲从、残暴等人性和文化中的“劣根性”，是对现代“启蒙”思想的继承。表现城市社会以及各种人物，一直是山西文学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在新锐作家的创作中得到了改观。李骏虎的《局外人》《流氓兔》，手指的《我们干点什么吧》《我们为什么没老婆》，闫文盛的《掌上的星光》，小岸的《茉莉花》《唐娜姨妈》，孙频的《流水》《鱼吻》等，都描绘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和形形色色的城市人物。山西新锐作家在塑造人物上也有高度的自觉，如王保忠《美元》中的山村女孩，《前夫》里的巧枝，葛水平《第三朵浪花》中的王友才，杨凤喜《镰刀》里的老田驴等，都是既有鲜明个性又有文化蕴涵的成功的人物形象。

在短篇小说“怎样写”的问题上，山西新锐作家一面继承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一面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法，在艺术模式、表现方式、叙事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拓展和实践。如杨遥、王保忠、杨凤喜在故事情节和人物心理的融合上，张乐朋、李来兵在小说复杂结构的营造上，手指、李燕蓉在现代表现方法的借鉴上，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路数和特色。尽管他们的创作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局限和问题，但他们正在走向成熟和强大。

黄土地上的七色花

□傅书华

近年来，伴随着社会的整体转型，在山西涌现了一批或卓有成就或前景看好的新锐女作家，葛水平、小岸、孙频这三位分别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70年代、80年代的女作家，她们代际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或能说明山西女性文学的发展路径。

葛水平出生在赵树理的故乡，她的小说写作范式与赵树理的小说写作范式是“形不似神似”，是真正在“神”上继承与弘扬了赵树理的写作精血与真谛，且有着许多让我们可以对之给予言说的地方：郭沫若说赵树理一开始出现时，即是一棵“大树”，葛水平也是如此，2004年以中篇小说《甩鞭》《地气》等爆响文坛，其实二者在成名之前，都已经有了长期自觉的文学追求和文学写作的积累与准备。赵树理以《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及对此的政治“误读”而成名，但他最好的小说《李家庄的变迁》却没有能得到超过《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的相应的评价。葛水平则以《甩鞭》《地气》及对此的文化“误读”而成名，但她最好的小说《裸地》却也面临着同样不能得到超过《甩鞭》《地气》的相应的评价的危险。葛水平的小说写作或被誉为写出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或被批评为女性意识的缺失，我认为只能是对葛水平小说的一种解读而不能穷究其本相。如果说葛水平较之赵树理有什么大的不同的话，那么，可以说，赵树理写作的价值视角是农民的现实生存需求与精神向往，葛水平写作的价值视角则是乡村女性的现实生存需求与精神向往。在这一点上，显示了葛水平较之更为年轻一代女作家的成熟，也显示了葛水平较之老一辈作家的新锐。

小岸的小说以写男女情爱为主，并以《水仙花开》《半个夏天》《温城之恋》等几十部被多家杂志转载的中短篇小说而为众人所知。如果我们仅仅把小岸的小说当做一般的男女情爱故事去读，那么，我们就会对小岸小说主题的深刻性视而不见。如果我们把小岸的小说放在一个大的历史、现实的社会视野中去审视，我们当会对小岸的小说刮目相看：在几千年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人不是作为“个人”的存在，而是作为特定的社会符码的存在，如官吏、商人、农民、父亲、丈夫、弟子等等。人不是作为“个人”说话，而是作为特定的社会符码说社会为这一符码所规定应该说的话。今天的中国，社会形态和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中国人的“个人”生存有了广阔的生长空间。当今成为中国社会、思想、精神、情感各种矛盾“焦点”的，是“个人”的存在建构、价值建构，而男女情爱则是这一建构中最为敏感、深刻、微妙的存在。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会说：人与人的最自然的关系就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也或许正是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会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可以通过女性情感的解放作出最精确的测量。小岸的小说颇具深刻之处还在于，在作这种测量时，她是将男女之间的情感置于神性、人性与社会性的纠结状态中给予体现的。所谓神性，是指不可企及的只存在于彼岸世界的人性的完满性、理想性实现。所谓人性，是指在社会历史总和基础上的“个人”所应该具有的存在形态。所谓社会性，是指在一个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一切社会历史总和基础上形成的社会法则。如此，小岸就让她笔下的主人公，既站在坚实的中国乡土大地之上，又给以超越现实的神性之光的照耀。

孙频的小说以写都市青年一代女性为主，又通过对此的描写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焦虑与价值困境。她目下主要的代表作是《合欢》《鱼吻》《耳钉的咒》《天堂倒影》等几十个中短篇小说。孙频的小说有三个鲜明的特点。第一，是她着重写了在饱经了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物质满足的淘洗之后，而不是在拒绝了或没有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物质满足的对个体真情的迷恋、眷顾、执著及其悲悯情怀。在作这样的揭示时，她持的是三刃剑，既批判了不知身体、欲望、物质为何物的虚伪的道德伦理，又对身体消费、欲望泛滥给以尖锐的抨击，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作了这样的批判、抨击之后，她又将剑锋直指因之而来的现代人的无法摆脱的生存困境与价值迷思。第二，她着重写了现代都市女性在没有了物质生存危机后，对体现在琐碎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性情感追求，这种追求是不易为人察觉和理解的，但却因为更能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程度”而更为深刻更为厚重，是我们这个伴随着人的解放而进入“个体日常生活审美化”时代的前沿性“症结”。第三，孙频也写女性表面卑贱、琐碎、世俗、失败、黯淡的生活与命运，但却使之因为体现了脱离物质需求的人的精神、情感性追求，从而使这些描写有了光泽、温度、暖意与价值破碎后的悲剧性意味，也因之使孙频的这些小说，不同于那些给底层女性以人文关怀或者暖意同情或者诗意赞美的“底层写作”，不同于那些写平凡人生日常生活原生态的“新写实小说”，也不同于那些以女性日常生活凸显生命意义的女性写作。

“山西新锐作家群”评论